

在“第二个结合”中谱写浙江文化新篇章

——访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耕

“第二个结合”是贯穿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和根本方法论，深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就要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不仅必须结合，而且可能结合。浙江在推进“第二个结合”中，应以深入研究“浙江精神”为切入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浙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

■ 本报记者 肖国强 章忻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那么,我们如何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和重大意义?浙江在推进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中,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哪些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杨耕教授。

“第二个结合”:不仅必须,而且可能

记者: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高屋建瓴、博大精深。那么,在您看来,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是什么?

杨耕: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深刻思考的产物,既谱写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篇章,又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当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基于对文化本质和功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思考,部署实施了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为浙江文化建设构筑起“四梁八柱”。从一定意义上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和文化建设的实践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起点、理论原点 and 实践基点。到中央工作之后,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问题作了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的思考,并将现实问题提升到理论问题,将理论问题又升华为理论观点、思想体系,从而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

我们如何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博大与精深?这与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密不可分。习近平文化思想本身就是“第二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而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线索和根本的方法论就是“第二个结合”。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博大精深,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同样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发现 and 深刻把握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发现和深刻把握了人与世界的总体关系,至今仍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这两种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相结合的产物,习近平文化思想意蕴深刻、博大精深不言而喻。我们只有真正理解“第二个结合”的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理论意义,才能深入而全面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

记者: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

的发言中提出,“第二个结合”不仅必须,而且可能。那么,您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结合”的理论前提和理论依据是什么?

杨耕:实现“第二个结合”,不仅在于“必须”,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有可能性。马克思曾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就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那样具有共同之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如此,二者之间同样具有“共同之点”;这种“共同之点”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具有“契合之处”。正是这种共同之点、契合之处构成了“第二个结合”可能性的理论前提、理论依据,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的内在规定性。

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关注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规则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而且,中国传统文化离它所维护的封建制度的时间越远,它的意识形态属性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的现实性也就越凸显。因此,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把中国传统文化转变为科学研究对象,对它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批判,达到对它的客观理解,并把其中的优秀文化从原来的文化形态中解析出来,放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之上加以重构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个新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

理解“第二个结合”时,我们要避免落入三个误区:一是把“第二个结合”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例子,这是外在的拼接,而非内在的融合;二是把“第二个结合”理解为范畴的简单转换、观点的简单对接,如把物质变成“气”,矛盾变成“阴阳”,规律变成“道”等,这是文字游戏、简单类比,而不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把“第二个结合”理解为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建构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这种“化”的结果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空心化”。

我们应当明白,不是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传统文化避免了同中国近代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传统文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推向世界,使孔夫子名扬四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有了可能。

我们应当明白,探寻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共同之点、契合之处,并对和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之点、契合之处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第二个结合”,理论目标就是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不仅属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属于中国文化;这种新的文化生命体将构成中国



图为杭州国家版本馆“文献之邦——江南版本文化概览”。

<div>● 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实施20年来,浙江从建设文化大省到迈向文化强省,西湖、大运河、良渚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div> <div>● 农村文化礼堂实现500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div> <div>● 全国文明县实现设区市“满堂红”;</div> <div>● 59部浙产作品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div> <div>● 文化特派员实现所有乡镇(街道)全覆盖;</div> <div>● 《黑神话:悟空》等“文化+科技”现象引发全球关注</div>	数据来源:浙江日报 制图:戚建卫
--	------------------

文化的主体,是我们文化自信的根基所在。这同时表明,“第二个结合”既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深刻理解。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进“第二个结合”

记者:文化的发展与社会制度和现实实践密不可分。从宏观层面来看,您认为,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基于何种现实的需要?我们应以什么为思维坐标推进“第二个结合”?

杨耕:“第二个结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双重逻辑发展的需要。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一个经济的平面上进行的,而是在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过程中展开的,它不仅需要以经济为基础、政治为中介,而且需要以文化为导向。因此,“第二个结合”所创造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也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的历史命题,并明确提出了“第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

结合。同时,毛泽东又提出,要“学习”“总结”“承继”中国的历史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以,毛泽东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并认为这是一个“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领悟这一“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新时代的极端重要性,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真实关系,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可以说,“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实践基础,“第二个结合”使得“第一个结合”具有了深度的文化内涵,并夯实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这就使中国人民不仅从科学上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而且能从文化上自觉地认同马克思主义。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一个新境界。

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命力不是割裂、抛弃传统,而在于是在何种程度上继承以及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再造传

统。问题在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什么、扬弃什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什么、发展什么?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什么、如何结合?这既不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也不取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归根到底取决于现实的实践需要,即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历史已经证明,凡是背对现实实践和时代精神的传统文化,最终只能作为思想博物馆的标本陈列于世,而不可能兴盛于世。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依然占据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于它面对现实实践和时代精神,与时俱进。从根本上说,任何一种历史反思、文化创造都是由实践激发的。比如,正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性,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理念向我们发出了“迷人的微笑”。再比如,市场经济的实践使古老的“义利兼顾”思想闪亮登场,如此等等,这同时也让以“永嘉学派”等为代表的“浙学”焕发新的生机。总之,我们应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为思维坐标,持续深入而全面研究“第二个结合”,而不是在书斋中寻找“微言大义”。

用独特的浙江文化展示当代的中国文化

记者: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20年的实践探索,为“第二个结合”提供了哪些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浙江应如何传承好“浙学”等思想文化传统,持续推进“第二个结合”?

杨耕:浙江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发达,更在于它的文化多样性、包容性。万年上山、八千年跨湖桥、七千年河姆渡、五千年良渚、千年宋韵、百年红船,都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群星璀璨的浙籍文化大家、独树一帜的“浙学”传统,在中国文化史上镌刻了光彩夺目的印记,为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省域治理的方方面面,提出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在省域层面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文化、如何建设文化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省域层面对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目标任务、发展战略、发展途径等基本问题形成了系统的规律性认识,不仅为浙江从“文化大省”迈向“文化强省”提供了行动指南,而且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素材和实践经验。比如,从“两只手”看深化改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传统哲学“无为”和“有为”的思想中,深入思考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的辩证关系,更好发挥“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作用。再比如,提炼出“浙江精神”的新内涵,提出“源远流长的浙江精神,始终流淌在浙江人民的血脉里,构成了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

我个人认为,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先行者,浙江在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方面同样应该是“先行者”。在推进“第二个结合”,创造新的文化生命体的过程中,浙江一方面应以新的实践为基础进一步深入而全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深入而全面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方面走在前列;一方面要正确理解文化典籍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善于把文化典籍中的思想资源转化为优秀文化,激活“浙学”等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另一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中的有益部分,并不断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浙江是中国革命红船的起航地,浙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红色文化的汇聚点、集合地。因此,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浙江应以深入研究“浙江精神”为切入点,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我个人认为,浙江应办好国际化的良渚论坛,让良渚论坛不仅是浙江的,而且成为中国的、世界的,成为世界文化、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论坛,从而以“浙江精神”反映中国精神,以“浙江文化”展现中国文化,以“浙江之窗”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专家简介:杨耕,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会副会长。曾任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 吴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述,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一大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浙学”作为一种富有特色、充满活力的地域文化形态,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在历史上促进了浙江与中国的文明进步,而且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仍然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今天,我们追溯历史,挖掘“浙学”的内涵、价值与意义,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需要,也是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具体而言,我认为“浙学”的人文精神传统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以儒学“仁和”思想为精髓。

虽然“浙学”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态,比如古典浙学、义理浙学、历史浙学、文献浙学、文化浙学、生活浙学等,但其目的宗旨和价值取向,却是高度一致而统一的,即以“仁学”为精髓的思想体系,而“仁”也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发展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我们需要从文化层面思考一个理论问题:如何概括中华文明核心理念。孔子曾将华夏文明概括为礼乐文明,但身处“礼乐崩坏”的春秋末期,他着重论述其“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和“为贵”的“仁和”理念,并把“仁”的学说施之于政治,形成仁政说,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其后的子思、孟子、荀子等人,都继承了孔子的仁和思想并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局面。自此,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滋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浙学”诸学派从中原儒家仁道思想出发,既注重心

性理学,又强调经世致用,对宋明理学进行拓展。无论是注重理学与心学的吕祖谦,还是陈亮的“事功”思想、王阳明的“心学”“知行合一”,均在中原宋代理学基础上有所发展,更加突出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

二是蕴含“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精神。王阳明“万物一体”理论包括“一体之仁”“圣人之心”以及“明德亲民”,他继承了中国哲学史上“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并在其知行合一的理论向度中体现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圣人之心,进而明确了“明德亲民”“致良知”的实践方向,构建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理想图景。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万物一体”中强调的自我与宇宙的统一,启发着我们要避免陷入“征服自然”的斗争哲学思维,理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并付诸实践。

三是蕴含“以人为本,人民至上”

的民本精神。浙学思想家大都崇尚“民本仁政”的观点,比如,王充曾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主张为政者要走出庙堂,敬畏民意、关注民生,到草野和江湖中去观察、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从古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由弱变强战胜强大的吴国,到浙江历经40年奋斗,从资源小省成长为经济大省,再到浙江承担起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民本”思想始终根植于浙江人民的精神血脉中。

四是蕴含“实事求是”的求实批判精神。从王充到陈亮、叶适、王阳明、黄宗羲以至章太炎、马一浮,求实批判精神始终贯穿于他们的学术思想。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也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

至惊涛骇浪。”这是在提醒全党,要注意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所面临的重要“实事”,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五是蕴含“多元和谐,兼容并包”的包容精神。浙学传统历来具有多元包容、和齐同光精神,如黄宗羲强调治学要善于做到“会众合一”,章学诚强调“道并行而不悖”。蔡元培更是一再强调“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形成北京大学的优良校风与学风。“多元和谐、兼容并包”是积淀在浙江人民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并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环境中为形成具有时代的浙江精神提供养分,使得浙江人特别能够适应和发展市场经济,锤炼出强大的民营经济。

上述五点从根本上体现了“浙学”的人文精神传统,同时这种人文精神也是有机的思想整体。其中,“仁和”是思想内核,“万物一体”是宇宙观,“以人为本”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实事求是”是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而“多元包容”

既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是创新创业者必备的人文素质。浙江之所以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实则与隐藏在经济发展背后以“浙学”为人文基因的浙江精神密不可分,这种人文基因始终引领着浙江人民不断自我诊断、自觉反思,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进取,推动着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我们要树立从历史传统中寻找动力的理念,深入总结、提炼浙学的思想精华、人文精神、道德精髓,深刻把握浙江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浙学为智慧观照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领悟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念自信,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思想力量。

(作者为浙江省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浙江省社科院二级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名誉会长)